

总体策划 草原部落
责任编辑 夏剑钦
封面设计 鲍 昆

“草原部落”名报名刊精品书系
天火——《书屋》佳作精选(上、下)

贺雄飞 主编

周实 王平选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固安印刷厂印刷

200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32

字数:800,000 印数:1-3,000套

ISBN7-80520-881-6

I·491 定价:5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北固安印刷厂调换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辑/接近世纪初

- 3 李南央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
22 王安忆 接近世纪初
29 禾 谷 阅读广告
32 余开伟 伟人的卑微
36 张远山 范文教学法
41 周泽雄 民族文化的走向
47 王开林 模铸的悲哀
52 王 石 《荷花淀》的结构破绽
56 严 秀 儒林与打假
62 杨 炼 眺望自己出海
66 周泽雄 余秋雨：最酷的作家
73 赵无眠 话说屁股
79 祝大同 如厕

第二辑/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

- 87 朱学勤 引进常识
92 景凯旋 常识的立场

- 98 何清涟 漫游二百一十年前的美国费城
- 113 何清涟 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危机
- 121 何清涟 李辉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
- 163 向继东 杨小凯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
- 170 郜元宝 经济学“来了”
- 177 王彬彬 随笔、文学、经济学及其他
- 187 残 雪 万彬彬 文学创作与女性主义意识
- 203 邢小群 梅 娘 人间事哪能这么简单

第三辑/毫无目的的残酷

- 215 单世联 革命成功之后
- 228 景凯旋 毫无目的的残酷
- 235 陈家琪 “文革”话语管窥
- 243 林贤治 夜读遇罗克
- 250 江小燕 致余开伟先生
- 259 余开伟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
- 263 智效民 薄命如妾一书生
- 269 智效民 萧乾与杨刚
- 278 黄一龙 关于反右派的“公开动员令”
- 284 丁 东 逢场作戏的悲哀
- 291 吴祖光 知遇之恩
- 297 胡文辉 梁漱溟的勇气
- 302 苏双碧 王宏志，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
- 309 张业松 路翎陈述

- 315 朱 正 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
 324 单世联 历史的纪录与革命的反思
 331 苏 文 读不懂高尔基
 338 蓝英年 贝利亚的用处
 344 刘洪波 契卡主义

第四辑/“窝里斗”大观

- 351 王 洁 美国人的性生活与自由
 355 谈瀛洲 印度房中书之祖——《欲经》
 361 张梦阳 史密斯和他的《中国人的气质》
 368 陈 村 意淫的哀伤
 382 残 雪 灵魂疑案侦察
 390 残 雪 艺术复仇
 397 邓晓芒 关云长的品格与阿喀琉斯的性格
 409 刘烨园 “古拉格”方舟
 412 陈家琪 心境
 416 陈家琪 入戏的观众
 422 胡绩伟 读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有感
 428 萧 乾 读邵燕祥的《人生败笔》
 430 萧 乾 读李锐的《“大跃进”亲历记》
 432 邵燕祥 历史需要注释
 438 邵燕祥 从“排句事件”说起
 445 易中天 “窝里斗”大观
 452 季广茂 义旗下的哭泣
 459 程亚林 《意淫与禅让》发微

- 463 张新颖 《自由交流》所指出的
- 467 薛隆基 一本书的遭遇
- 470 薛忆沔 被遗弃的《遗弃》
- 473 希 路 早已失去的净土
- 477 胡文辉 1984 爱人同志
- 481 夏剑钦 《迎旭轩韵文辑存》跋
- 484 陈思和 关于《亭子间嫂嫂》
- 490 鄢烈山 不识时务的人 不合时宜的事

第一輯

接近世纪初

我有这样一个母亲

□李南央

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,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,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并且几乎所有写母亲的文章,无不是歌颂母性的。而我取稍有贬义的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”作为此文的题目,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。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,奇特到一定要写出来。我的朋友和熟人当中,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李锐的多。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,更具戏剧性。

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,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。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,也因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,我都写在这儿了。

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。一九九三年,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,威廉女士正在拍摄《中国革命》的第二集。听说父亲即将访美,约了采访他。父亲到美后,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,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《中国革命》的第一集看。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,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像我妈妈,但是没敢吱声,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:“再放一下,刚才那个镜头好像是范元甄。”我这才说:“我也觉得有点像。”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。“没错,就是她!”父亲说,“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。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,王明一下就看上了,说‘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’。事后找人了解,

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。”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纪录片中。母亲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，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（陈伯达在延安说过：“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。”）。父亲的镜头反反复复地在影片中出现并被选做了片头。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，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。父母两人合了分，分了合，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。先是抗战初期，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，后任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记者。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。她到延安后，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，还附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，母亲一直珍藏着。母亲在延安时，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。我爸多次对我说：“你妈比我有才华。”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，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，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。事后，大家笑传了很久。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。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。她上山，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，主席闪到一边说：“小范同志你先走。”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。还有一次，她在窑洞前纺线，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，一抬头，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。可见，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。

“一二九”运动时，父亲代表武汉大学，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。一九三九年，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。妈妈后来告诉我，史良曾为她惋惜：“结婚太早了！”在我懂事后，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，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，好像毁了她的一生。婚后不久，两人同去了延安。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，这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。

抗战胜利后，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，很感到失去了自我。延安

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。第二个孩子(我哥哥)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降生在卡车上。到热河后,她始终不愉快,跟爸爸不断地吵闹,直到被派至北平,参加了党办的《北平解放报》的工作,心情才好一些。以后南下,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,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副厂长。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。不记得是五六年还是五七年,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。毕业后,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——对外称青云仪器厂,对内代号二三二厂,当了总工程师。

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,感到特神秘,特兴奋。然而妈妈在这个新的、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,爸爸被打倒。她立即一落到底,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,接受改造,身体随即彻底垮掉。

我的记忆中,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,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。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,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,忘了家里的规矩,一边干活,一边哼起了歌儿。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:“你有什么可高兴的?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!”

我是一九五〇年在长沙出生的,一九五二年随父母到了北京。我从记事起,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,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。我两岁进全托幼儿园,七岁住校,两个礼拜回家一次。什么时候回家,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,就什么时候吵架,吵得昏天黑地。说是吵架,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,没听爸爸吱过一声。他总是坐在沙发上,背靠在那儿,双手交叉在胸前,双目紧闭。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:“说呀!你说呀!”最厉害的一次,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,像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,我终于忍不住,在走道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第二天,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,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,像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,又用了很多年。我那时总闹不明

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，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。等我长大后才知道，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。

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已久。父亲是独子，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。父亲自己坦陈当年并未好好学习，闹了革命。奶奶听人传话，知道儿子在闹革命，很是危险。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。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，一九三七年五月竟不辞而别，悄悄北上北平。自此再未返校，也没回过家，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。以后抗战、内战，音讯全无，生死不知。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当夜，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。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，三十二岁守寡，不愿屈从婆母管制，一人含辛茹苦，靠借债，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，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，没有像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，与儿子抱头痛哭，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。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，请求奶奶原谅他这个不孝的儿子。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，听说此事勃然大怒，回去就吵，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，却给地主母亲下跪，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。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。我爷爷一九〇五年到日本留学，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，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，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。奶奶回到平江老家，从婆母手中分到一些田地，但由于闹红军，田租收得很有限，根本不足以为生。

一九五九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，想到儿子家住几天，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，有个面子，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。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，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，只好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。奶奶大骂儿子不孝，不许老娘进家门。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。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。老人封建，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，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。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，奶奶又要跟儿子，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。然而还未成行，老人就去世

了。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。

在我九岁的时候,家里没有了爸爸,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。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,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,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。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!常常整晚上地挨骂,不许睡觉。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:“你从小心眼就狠毒,三岁就说打死妈妈。你和李锐一个样。”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,因为什么说要“打死她”。心里说,“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,真是没意思。”阿姨说,我见了我妈就像耗子见了猫。放了学,只要听到妈妈在家,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,再不出来。我妈说我不叫她妈。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。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:“你这个小李锐!你跟你爸一模一样!”每次有客人来家,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:“这姑娘越长越像李锐。”可总有些不识相的大人爱这么说。他们根本不知道,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,是提不得的。

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,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,吵了她的瞌睡,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。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,开门。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。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。

妈妈是最革命的,我心里想,“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,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?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,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?”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。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,听人家的冷言冷语,看人家的脸色,那种滋味儿,那种难堪,真是无地自容。我就写日记,把对妈的疑问、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。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。报纸上、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。我在日记里说:“我没有母爱,也不需要母爱。我将来当了兵,在连队里有指导员、连长关心,爱护我。”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,我到处藏。有一次,妈妈发脾气,讥讽我:“你小小年纪,还母爱、母爱的,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!”我

才知道，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。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。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，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，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：“偷看人家的东西，太不要脸！”

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。初一的暑假，趁妈妈在南方疗养，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，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，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。可是妈妈一回来，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，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、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，跟李锐一样。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。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，教练到家里来做工作，让我妈大骂一顿。教练从我家出来，脸上连血色都没了，气得浑身哆嗦：“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！”测向队是呆不成了，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，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，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，选拔国家队。每次活动，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。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，只好常常缺勤。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，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、品质恶劣的坏孩子。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，那必是大人的错。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。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：“这个孩子总爱撒谎。”但凡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：“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做家长的错，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。扪心自问，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。”

后来，文化大革命了。我在学校挨斗，回家一言不发，精神极沉闷。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，问我怎么了，态度极和蔼。我有些受宠若惊，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，不由自主地流了眼泪，告诉妈妈，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，也有她的因素，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。还没等我说完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，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的冷笑：“啊哈！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，自己最坚强吗？哭什么！跟我说什么？你在学校挨不挨斗，跟

我没有关系，不要往我身上扯。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。以后，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。你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坚强，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。我在机关挨斗，又向谁去哭？”我那时还不到十六岁，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，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，从里到外都冻僵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、麻烦、痛苦，再不向她诉说哪怕一句，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。

不过，我并不是这个家里惟一遭到妈妈虐待的。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“人人有本血泪帐”吧，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。

我的大舅（我妈妈的大弟），用我爸的话，是个很有才华、非常能干的人——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。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，一生贫困，郁郁不得志，五十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。他是我妈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。快解放时，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。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，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、女婿。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，一进武汉，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、崇拜共产党、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。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，家里替他藏了哪些财产。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，大舅当然不承认。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，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，单位来人抄了家，还给舅舅连降两级。

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，小小年纪受了惊吓，得了心脏病。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。最后一次犯病，她写信告诉我妈，想借些钱再看看病，争取新的希望。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。可是事过没几天，又一封长信追过去，把小姨大骂一通，说小姨没有良心，范家的都没有良心，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，只跟她要钱。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，就因为给小姨寄钱，这个月没钱买补药、买海参。小姨读了信，当下差点没气死，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，几天后就咽

气了。妈妈的信在小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，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。小姨临死前，对大姨说：“你们要有良心，我死后，绝对不许通知大姐。”

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，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。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，又是老革命，就征求她的意见。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，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，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，不适于出国学习，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。我大姨（我妈的大妹妹）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。八十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，中央定了一个杠杠：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，都按离休干部对待，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。我妈却对我大姨说，她记得大姨是十一月后参加的工作。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。管事儿的干部说：“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。”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。

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。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，解放后被我妈要到北京。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，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。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，自己不去，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。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，迈着一双小脚，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钟。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，后要遭我妈的漫骂，常常坐在屋里掉泪。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，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。我妈从干校回京后，阿姨已五十多岁。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，挤在灶台间睡觉。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，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，端到那里给她吃。饭菜稍凉了些，就要骂人。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。

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和先生，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悌忠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，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。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。

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，裁成黑箍戴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。广场已降了半旗，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，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。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。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。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，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七平方小屋。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。

老阿姨一直没有睡，在等着我。我一进门，就急急地对我说：“你妈发了大脾气，你快点过去看看吧！”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，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，还没容我开口，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。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，太不要脸。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，悌忠本人老奸巨滑，不是好东西。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，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。说我在外面乱搞，和人家弄出孩子来，她也不管。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，就回了一句：“你胡说八道！”这就更不得了了，她一下子歇斯底里，连声让我滚。妹妹躲在被子里“呜呜”地哭出声。我一路哭，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，伤心地问阿姨：“阿姨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？”这么些年，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。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。当晚思前想后，下决心走自己的路，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，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，离开了家。自此，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，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一九九四年圣诞节，那是我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。跟妈妈则不止四年没见了。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。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，证明愿意见我们，于是约好了时间。为防不测，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，被我妈一口回绝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我们已感到不大妙，可能会挨骂。哥哥说：“骂，你就听着，别还嘴。”我带着女儿去了。一进家门，那久违了的黑沉、抑郁、死寂的感觉就一阵阵地压了过来。难怪大姨总说，去

一次，回来要压抑好几天。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。妈妈开了门，我心提到嗓子眼儿，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。“来了？进来吧。忙忙（我女儿的小名）长这么大了，变得像个女孩子了，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。”我心里揣摩着，“行，开头还不错。”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。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，到处积满了灰尘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。屋里惟一值钱的，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。这还是五十年代，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。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。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。这个古色古香、年深日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“文革”中被扫地出门后，妈妈惟一没想卖的东西。现在，它还是老样子，我就坐在它的旁边。

妈妈说：“自己倒水吧。杯子脏，我也没精力洗，你自己洗洗。”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，我没洗，倒了一杯凉开水。妈妈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。我很熟悉它，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。屋里没有沙发，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。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，不如说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，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，只是凑合着活着。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，眼睛只觉涩涩的。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，一包西洋参，一套不粘锅炊具。我说：“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，但听大姨说，常有假货，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。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，给你买了套不粘锅，炒菜可少放些油。”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，“范元坤，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？！陈忠介（我姨父）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，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！”那种尖酸、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。

我暗暗骂自己，“好好的，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。”我太知道，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。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，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，他没办法拒绝，才硬着头皮办的。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，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，反过来又把别人